

· 翻译史研究 ·

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

马士奎

(北京大学 英语系, 北京 100871)

摘要：人们习惯用“一片空白”来描述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状况。实际上，在此期间文学翻译仍然以一种畸形的状态存在着。按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这期间外国文学译作的存在形式有三种——公开译作、内部译作和潜在译作。文革十年的确是近百年以来外国文学翻译的最低潮，但对翻译工作者们在这一特别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也不能完全抹杀。

关键词：文化大革命；文学翻译；公开译作；内部译作；潜在译作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2003)03-0065-05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ry Work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 Shikui

(English Dep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People tend to completely neglect the existence of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ry work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fact, literary translation did exist in one way or another. Dictated by the then dominant social ideology, the translated foreign literary works fall into three categories — openly accessible translations, translations with restricted circulation and unpublished translations. It is true that literary translation reached its nadir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but we should not disregar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translators during that special period.

Key word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 open translations; restricted translations; unpublished translations

中国的文学翻译是在晚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大潮中兴起的，此后文学翻译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成为翻译活动的主流，并对新文学的创建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1949年以后，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看，中国又重新走向封闭，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建国初期的外国文学译介工作总体上还是健康发展的，从六十年代起，文学翻译开始出现颓势。文革十年间，文学翻译进入了自晚清起大规模译介外国文学作品以来的最低潮。许多翻译家，如老舍、傅雷、丽尼、丰子恺、穆木天、萧珊、满涛等先后逝世，巴金、夏衍、穆旦、萧乾等多人受到冲击；译介外国文学作品被斥为“崇洋媚外”、“兜售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货色”，以前翻译出版的绝大多数外国优秀文学作品都作为“大毒草”而被书店和图书馆封存，连翻译一度被奉为榜样的苏联文学作品也是“为修正主义招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甚至否定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传统，认为“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一个空白”^①；《世界文学》、《翻译通报》等刊物停办，翻译理论研究领域几成空白。文革结束后，对人们的思想禁锢一俟解除，文学翻译迅速得以恢复，仅一九七八年一年，全国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作的数量即超过了文革十年期间的总数。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逐渐进入正常的轨道，中国的文学翻译在实践和理论研究方面的活跃程度都超过了以往。

文革中译介外国文学的成就主要是在后期取得的。一九六六年初，尚有《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十一

收稿日期：2003-03-03

修订稿日期：2003-03-30

卷）等译著出版。从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全面爆发到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五年多的时间内竟没有出版一部外国文学译作。一九七一年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标志着党的文艺政策有了一些调整。此后，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著作逐步有所增加。

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译作有三种存在形式：一、公开译作——各出版社公开发行的外国文学译作及少量登载在公开刊物上的作品；二、内部译作——各出版社内部发行的译作及发表在内部刊物上的仅供少数读者参阅的外国文学作品；三、潜在译作——完成或基本完成于文革时期，由于不符合当时的文艺方向而在文革结束后几年内发表的作品。这三种译作的形成是由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决定的。

公开译作

文革时期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作大致有三十四种。十年间公开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作不仅数量极少，而且类型单一。这三十四种译作中包括少量以前已在国内出版过的苏联和日本文学名著的重印、再版或重译，其他主要是来自一些友好国家的新作品。这些作品前面大都有一些评论或序言，多为群众性的文艺评论组织撰写，如大庆油田部分工人和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工农兵学员”和“革命教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阿友好公社文艺评论组”（《火焰》），“北京大兴县中朝友好人民公社业余文学评论组”（《朝鲜短篇小说集》），“四八〇〇部队某部理论组”和“北大俄语系苏联文学组”（《青年近卫军》）等。这些评论或序言都肯定作品的积极意义，有的还歌颂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赞扬这些国家的人民在保卫和建设国家

中所取得的成就。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世界革命的中心，担负起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解放的斗争的使命，同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则服务于这一使命。十年间，对友好的人民民主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作品的翻译成为主流，且其中多数为这些国家当代作家的应时新作，这在我国的文学翻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一个阶段。文革期间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几乎成为当时外交形势的晴雨表。其中反映印度支那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作品有八部，包括越南的《运枪记》、《战斗的越南南方青年》（第三集）、《巴拿的游击队》、《越南南方短篇小说选》，老挝的《生活的道路》和《老挝短篇小说集》，以及《柬埔寨通讯集》。较有代表性的是老挝作家伦沙万的中篇小说《生活的道路》，该书讲述的是贫苦少年经过斗争的洗礼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的经历。在这一时期，非洲大陆的民族独立运动又有长足进展。一九七五年二月，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访华，两国与六月二十五日莫桑比克宣布独立日建立起大使级外交关系。同年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便出版了《莫桑比克战斗诗集》。“首都钢铁公司工人评论组”在序言中热情赞颂这些诗不是“发自旧时代的诗人之口的浅吟低唱，而是发自为民族解放英勇战斗的自由战士心田的战斗号召”，是“斗争和胜利的诗篇”^②。中国始终支持阿拉伯和巴勒斯坦人民反抗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侵略的斗争，一九七五年一月，《巴勒斯坦战斗诗集》便也应运而生，所选二十九首诗歌记录了抗击以色列入侵的战斗生活。由于中阿两国之间特殊的“兄弟关系”，这一时期译自阿尔巴尼亚的作品有四种——《教师》（小说）、《阿尔巴尼亚短篇小说集》、《阿里果诗选》和《火焰》。其中最重要的是该国著名作家斯泰利奥·斯巴塞的长篇小说《火焰》。小说主人公青年干部库伊蒂姆·莫拉瓦响应阿劳动党发出的关于干部下放、支援山区的号召，毅然来到条件艰苦的马里卡乡山区。在那里，他们战胜了“右倾”保守思想，同“反动势力”，同落后的旧风俗、旧习惯进行了顽强斗争，在这场“改天换地的斗争”中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小说所描写的场景与当时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期译自朝鲜的作品有三种，即戏剧《袭击》、《朝鲜短篇小说选》和《朝鲜诗选》。这一类作品中，只有玻利维亚作家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的长篇小说《青铜的种族》不属于当代题材，该书描写的是西班牙殖民者给玻利维亚印第安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以及他们的反抗斗争。

十年间公开出版的译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只有五种，都是“进步”的或“革命”的，其中日本作品三种，即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长篇小说《沼尾村》、《蟹工船》和《在外地主》，两部法国作品是《鲍狄埃诗选》和反映十八世纪末叶法国资本阶级革命的小说《诸神渴了》。这些译作全是旧作新译或旧译

本的再版，没有一部新作。其中《鲍狄埃诗选》收入了无产阶级诗人欧仁·鲍狄埃的《国际歌》、《自卫吧，巴黎》等二十首诗作，以反映巴黎公社时期的斗争为主，书前附有列宁在诗人逝世二十五周年时写的著名纪念文章《欧仁·鲍狄埃》。

自五四运动以来，苏联作品一直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中占重要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苏联文学被置于中国文学的榜样的地位。从五十年代末开始，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对苏联文学的介绍也冷却下来。连高尔基这样在我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作家，在文革前期也被否定，他的作品一度被禁读。直到一九七二年底，才开始陆续有苏联作品的译本公开出版，首先是高尔基的两部被认为“最没有问题的作品”——特写《一月九日》和小说《母亲》，随后，高尔基的另一部小说《人间》，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著作《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铁流》，法捷耶夫的小说《青年近卫军》、《毁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先后出版。上述作品全部是我国读者所熟悉的苏联著名作家的旧作，没有一部反映当代苏联社会生活的作品。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一九七五年四月出版了《苏修文艺批判集》，收入了一组批判当代苏联文艺作品的评论文章，并且附有这些作品的全文或梗概，使人们可以从反面对苏联当代文艺的发展状况有所了解。

文革期间，大部分刊物都被停办，在一九六九年，全国正式登记的期刊数只有二十种，成为近百年期刊史上年度出版种数最低点。一九七一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以后，一些刊物才逐渐复刊。几种翻译刊物中，上海的《翻译》月刊和北京的《翻译通报》（当时唯一的全国性翻译理论刊物）在文革前即已停刊，介绍外国文学的主要园地《世界文学》（前身为《译文杂志》）也在一九六六年第一期出版后停办。最后一期的《世界文学》上刊载的作品中除了越南作家的两首短诗和两个短篇小说外，还有日本和美国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包括文洁若翻译的松本清张的短篇小说《“帝国银行事件”之谜》和施咸荣等翻译的美国作家约·奥·基伦斯的长篇小说《于是我们听见了雷声》片断，以及著名诗人、翻译家冯至的评论文章《外国文学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前进》等。直到一九七四年，在公开刊物上才再度出现外国文学作品。这一年正式创刊的文学刊物《朝霞》设有一个不定期的栏目“苏修文学批判”，在近三年的时间里陆续登载了苏联剧本《普尔热瓦尔斯基之马》、小品文《骆驼的秘密》、小说《低声说话的人》和《扎格达伊金和他的孩子们》等当代苏联文学新作的全文译文或梗概以及相应的批判文章。这些作品大都同时发表在上海的一份内部刊物《摘译》上，并被收入一九七五年出版的《苏修文艺批判集》一书。

内部译作

文革期间外国文学翻译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公开出版和内部发行两条线并行。这种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

外国译作的现象始于五十年代末，到文革中、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以这种方式陆续出版了约五十种外国文学译作，作为批判“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反面教材。当时出版的这类译作的封面一般是淡黄色、蓝色或灰色，没有装帧设计，在当时的上海等地被称为“白皮书”，也有人称之为“黄皮书”。这些内部出版物主要供有一定级别的干部和研究人员参考，后来也在一些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中流传开来。同公开发行的译作相比，内部译作数量更多，类型更齐全，作品的艺术性更强，在社会上产生的反响也更大。此外，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上海创办了内部刊物《摘译》（外国文艺），到一九七六年底停刊前共出版三十一期，翻译介绍了较多的苏美日等国的当代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了解外国文学发展状况的主要窗口。《摘译》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文艺揭示苏、美、日等国的社会思想、政治和经济状况，为反帝防修和批判资产阶级提供材料”^⑨。该刊“编译组”曾在《答读者》一文中明确指出《摘译》“是一本只供有关部门和专业单位参考的内部刊物，……不是为了批判和研究，只是单纯的阅读，甚至为了‘欣赏’，而在人们中间流传，那是不对的”^⑩。

当时翻译出版的以苏联作品居多，许多译作前都有署“常峰”、“任一评”、“任犊”之类笔名的批判文章或“译者说明”，对作品从艺术上和思想内容上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如苏联剧本《德尔苏·乌扎拉》和小说《淘金狂》、《阿穆尔河的里程》等是典型的反华作品，试图洗刷沙俄在我国边境地区所犯下的罪恶，剧本《不受审判的哥尔查科夫》被认为旨在为历史上沙俄的血腥侵略罪行翻案，且是翻马克思、恩格斯定的案，“暴露了苏修假马克思主义，真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⑪；小说《核潜艇闻警出动》、《海浪上的花圈》、《火箭轰鸣》、《蓝色的闪电》和剧本《礼节性的访问》、《夜晚纪事》等都是为苏联的军事扩张唱颂歌的作品；《为祖国而战》是肖洛霍夫写的一部苏联卫国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以苏军一九四二年夏季在顿河草原上的保卫战为背景，译者认为“此书内容反动，艺术上趣味低级、极其拙劣，翻译此书的目的是为了给批判肖洛霍夫时提供一点材料”^⑫；译作中反映苏联当代社会生活的作品最多，如维·李巴托夫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和柯热夫尼柯夫的《特别分队》、《彼德·里亚宾金》都是表现当代苏联“无产阶级生活”的小说，出版后受到苏联官方的大力肯定，认为在这些作品中“出现了文学中的当代英雄”^⑬，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以童话的形式宣传了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落角》、伊凡·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和谢苗·巴巴耶夫斯基的《现代人》反映了当代苏联人的失意情绪，维·罗佐夫的剧本《四滴水》则以苏联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为题材，这类译作在读者中引起的反响最大。此外，从俄文转译的玻利维亚作家奥鲁佩萨（Oropeza）的现代派小说《点燃朝霞的人们》是一部

宣扬格瓦拉路线的小说，该书在艺术上有创新之处，作者使用把几个人物的活动、思想和对话错乱交织的叙述手法，来反映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日记中提出的所谓“游击中心”的思想，这种“新颖的叙事方法”受到苏联文艺界的称赞，它和曾获一九七三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大奖的苏联电影剧本《自由，这是个甜蜜的字眼》都被认为是“歪曲拉美革命运动”的作品。

内部译作中日本作品也占较大比重。一九七〇年，日本著名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自戕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他的《忧国》及《丰饶之海》四部曲——《春雪》、《奔马》、《晓寺》和《天人五衰》，作为批判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反面教材，同样以批判军国主义为目的的作品还有五味川纯平的小说《虚构的大义——一个关东军士兵的日记》和当时在日本成为头号畅销书的小松左京著科幻体小说《日本沉没》，类似作品还有发表在《摘译》上的“妄图以资产阶级人性论歪曲革命作家的形象”的日本电影剧本《小林多喜二》以及“从不同角度宣扬宫本集团修正主义，美化日修的头目们”^⑭的短篇小说《少年和鸽子》、《和子死后》等；日本作家有吉佐和子的小说《恍惚的人》揭示了日本老年人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反映了这个所谓“经济大国”、“福利国家”背后隐藏着的严重社会问题，桥本忍、山田洋次的电影剧本《沙器》，熊井启的《望乡》以及《故乡——日本的五个电影剧本》也对日本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问题有所揭露；日本著名作家、共产党员西野辰吉的短篇小说集《晨霜路上》所收的四个短篇——《晨霜路上》、《美日混血儿》、《不下蛋》、《C镇纪事》主要描写二战后美国在日驻军所引起的社会问题，反映了日本人民的反美情绪；《摘译》杂志曾选译了日本齿轮座剧团创作的多部剧本，如《春雷》、《河流下游的小镇》、《冲绳的早晨》和《波涛》等，该剧团曾在六、七十年代数次访华演出，被称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文艺战线胜利前进的革命文艺战士”^⑮，其作品主要反映了那个时代与政府声音不同的“日本人民”的呼声。

同期翻译的美国作品不多，其中包括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和以“风雨飘摇，大厦将倾”评论文章为序言的尤多拉·韦尔蒂的代表作《乐观者的女儿》，收在《美国小说两篇》中的《爱情故事》是这个时期引进的唯一一部外国爱情小说，而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电影剧本《迷路前后》则抨击了美国的种族歧视和种族压迫现象。

除苏美日三国的作品外，这一时期还翻译出版了其他国家的一些作品。《先人祭》（第三部）是波兰著名作家亚当·密茨凯维支的一部政治诗剧，该剧通过剧中人物的遭遇，特别是其在沙皇法庭、监狱所受的酷刑，控诉了沙俄的侵略罪行。埃及的政治讽刺剧《代表团万岁》是根据国内唯一的一份打印稿翻译的，该剧描写了某社会主义联盟凯法尔村村民对“法斯库尼娅友好代表团”的嘲弄和反抗，借此讽刺苏联的霸权主义政

策及其在中东地区的所作所为。坦桑尼亚作家约·克·基因比拉的《帝国主义必败》是一部以莫桑比克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为背景的作品。

除《摘译》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读者面较小的有关外国文学的内部刊物。在出书困难的情况下，作家出版社从一九六三年三月起开始编辑出版《外国文学新作提要》，共出版了十一期，一九六六年五月的最后一期是苏联文学专辑，除了介绍爱伦堡的反华言论外，重点介绍了涉及苏联“肃反扩大化”的五部小说。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苏联文学研究室于一九七三年六月创办了内部刊物《苏联文学资料》，专门介绍苏联当代文艺政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状况。

潜在译作

文革结束后几年内发表的外国文学译作，相当一部分都是翻译家们在文革期间完成的。这些当时没有机会发表的“潜在译作”成了文革期间外国文学翻译的一个重要成就。如巴金从一九七四年起悄悄开始翻译《往事与随想》，这是被列宁称为“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很大作用的作家”赫尔岑饱蘸血和泪用十五年的时间写成的一个长达八卷的回忆录。穆旦（查良铮）在一九七二年后除了完成凝聚了十一年心血的《唐璜》译稿的整理、修改外，又开始翻译艾略特、奥登、叶芝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他选的都是像《荒原》一类最难懂也最难译的诗作，这些同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学观念格格不入的作品直到诗人去世八年之后的一九八五年才得以出版（《英国现代诗选》，湖南人民出版社），成为新时期诗人创作的重要参照物。季羡林从一九七三年起着手偷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Ramayana），到1976年已基本完成这部鸿篇巨制的七篇中的三篇。季羡林之所以选译这部近三百多万字的巨著一方面是因为在那段日子里他希望“选一种比较难的、相当长的、能旷日持久地干下去的书”^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一部“非常值得而且必须翻译的书”^②。冯至也从一九七三年起翻译德国伟大诗人海涅的政治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于一九七八年一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些翻译家知道自己的译作在当时没有发表的可能，如季羡林所说是“为翻译而翻译”^③，他们抛却一切非文学杂念，完全按照自己的审美情趣去选择翻译真正的外国经典著作，为文革后的读者留下了一部部可以载入史册的译著。

文革期间的译者

文革期间，集体翻译成为一个突出现象，这是该时期文学翻译的一个显著特征。新译作署个人真实姓名的极少，多以翻译集体的名义署名，有的则署象征集体劳动且带有时代色彩的“齐干”、“齐戈”、“迅行”、“共工”之类的笔名，还有些是匿名出版。“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和北京的由国家出版局各直属出版社外语人才组成的翻译组是当时两个主要的翻译集体，前者包括草婴、冯春（郭振宗）、荣

如德等翻译家，后者成员中有萧乾、绿原等人；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高校教师也参与了翻译活动；在“工农兵占领意识形态领域”的潮流中，“工农兵学员”成为当时文学翻译的一支重要力量。这个时期的翻译工作是在高度组织化下进行的，译者完全没有选择作品的权力，他们是把翻译工作当成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也得不到稿费。译者在工作时通常要把一本书拆开，几个人分头翻译，最后由一人统稿。由于译者水平不一，集体翻译更是把复杂的文学翻译过程简单化为生产流水线，再加上缺少必要的工具书和相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译作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作品特别是某些“工农兵学员”的译作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原作的艺术特色，以致让有些读者认为苏联等国的作品“艺术上都是很拙劣的，有的简直让人读不下去”^④。对有些译者来说，这段工作经历并不愉快。曾参与翻译《战争风云》等作品的萧乾在文革后就曾表示过对集体翻译方式的反感^⑤，草婴甚至视这一经历“是一种耻辱”^⑥，荣如德则认为翻译《爱情故事》“是一生里做的最糟糕的事”^⑦。

综上所述，文革十年是近百年以来外国文学翻译的最低潮。这一低潮既体现在译作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但正是在这一低潮中孕育着我国文学翻译的空前高潮，没有这一低潮，就不会有文革后人们排队购买外国文学作品的场面和我国文学翻译的爆发式进步。事实上，在文革中后期，文学翻译和社科翻译、自然科学翻译一样出现了明显的复苏迹象；这一时期的译作在文艺作品极度匮乏的那个时代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公开译作虽数量少，类型单一，但对当时的一代年轻人的成长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作为批判工具而出现的内部译作中也不乏苏联、日本等国最新、最优秀的作品，其影响远远超出了预想的范围，特别是描写苏联等国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引起了读者的极大兴趣，而一些外国作家新颖的创作手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后起的一代作家，潜在译作在出版以后大都得到很高评价，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也使得翻译家们没有与原来的专业彻底隔离，这样他们在文革结束后不需要太长时间的恢复便可以迅速投入工作。文革期间的外国文学翻译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片空白”^⑧。评价这一时期的文学翻译工作，不能离开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和翻译工作者的处境，更不能将翻译工作者在这一特别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完全抹杀。

注 释

- ① 转引自《中国当代文学史》，第184页。
- ② 见王连华等译《莫桑比克战斗诗集》序言。
- ③④ 见《关于摘译的编译方针》，《摘译》1976年第3期。
- ⑤ 见北外俄语系工农兵学员译丹古洛夫《不受审判的哥尔查克夫》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 ⑥ 见史刃译肖洛霍夫《他们为祖国而战-长篇小说的若干章节》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 ⑦ 见上海外院俄语系译李巴托夫《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序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 ⑧ 见《摘译》1975年第5期。

- ⑨ 见1967年10月9日《人民日报》。
- ⑩ ⑪ ⑫ 见《季羡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第247、248页。
- ⑬ 见《摘译》1976年第3期“读者来信”。
- ⑭ 萧乾后来曾说：“关于文学作品，我最反对几个人合译。不过，1973年，我参加了《战争风云》的翻译工作，当时是为了借此可以不去干校。社会科学、文件也许可以合译，文学作品切不可合译。”见《萧乾文集》卷九，《关于外国文学》，第28页。
- ⑮ 翻译家草婴曾是当时上海新闻出版系统翻译小组的负责人，在谈到当年的经历时认为“这可以说是一种耻辱，完全没有那种我们在做自己的翻译专业的愉快心情。现在，我们那些人的的确都不那么愿意说起那些事，我家里连那些书都没有留，我不想再看到它们，想起来，心很痛。”见陈丹燕著《上海的风花雪月》中“白皮书时代的往事”，第217页。
- ⑯ 荣如德在谈到《爱情故事》的翻译时曾说：“我们当时没有任何资料，一些大写的词，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们译得不好，出了许多错误，这是我一生里做得最糟糕的事，从我的职业道德来说，心里是很过意不去……”。见陈丹燕著《上海的风花雪月》中“白皮书时代的往事”，第221页。
- ⑰ 《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一书认为“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时期，文学出版园地基本上是一派荒芜，那么外国文学的翻译出版，则真正是一片空白。”见曹治雄著《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下）第421页。
- [4] 席宣等.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
- [5] 朱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 [6] 谢显宜.中国外交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 [7] 靳德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
- [8] 王向远.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9] 铢中伦.当代中国的翻译[A].孔慧怡等.亚洲翻译传统与现代动向[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10] 北京图书馆.《中国国家书目》编委会.中国国家书目[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 [11] 曹治雄.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 [12] 季羡林.季羡林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 [13] 巴金.随想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 [1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 [15] 萧乾.萧乾文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 [16] 邹振环.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
- [17] 陈丹燕.上海的风花雪月[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 [18] 《摘译》1973年至1976年各期.
- [19] 《朝霞》1974年至1976年各期.
- [20] 《苏联文学资料》1973年至1975年各期.
- [21] 《外国文学新作提要》1963年至1966年各期.
- [22] 1966年至1976年期间出版的各种译作.

参 考 文 献

- [1]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 [2] 洪子城.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3] 谢冕等.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 1948~1975[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 马士奎，男，1967年2月生，山东费县人，现为北京大学英语系翻译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

[作者电子信箱] mashikui67@sina.com

[作者通讯地址] 北京大学博士生宿舍30楼136信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语言桥翻译社

——专业的翻译服务提供者

成都语言桥翻译社是西南地区较大的翻译服务机构之一，拥有二十多位专职翻译，数百位常务兼职翻译，为社会提供英、日、德、法、俄等各大语种，以及韩、越、意、西班牙、葡萄牙等小语种的翻译服务。

语言桥的优势：医药、铁路、IT、通信、工程、公证材料等英汉互译；且在俄汉互译方面具有较强的实力，多次承担大型的俄汉互译项目。欢迎同行与我们互通有无，协作发展。

语言桥始终坚持质量第一、诚信为本、客户至上的理念，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准、更快、更周到的翻译服务。

语言桥长期招聘各类优秀的专、兼职翻译，欢迎您的加盟！

★专业翻译 ★质量保证 ★交稿快捷 ★免费送取 ★全日服务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沙湾路77号新天地大厦3B-6-18 邮编：610031

电话：028-87685859/87681551 手机：13018247560/13808210540 传真：028-87675459

网址：<http://www.lan-bridge.com> 翻译部：translation@lan-bridge.com 人力资源部：hire@lan-bridge.com